清史研究前沿·政治制度与政治史

康熙朝南书房翰林政治活动探微

——以陈邦彦《匏庐公日记》为中心

杜 望

[摘要]《匏庐公日记》披露了陈邦彦在南书房行走时获取的大量政务信息，由于康熙朝后期的内廷翰林大多兼任阁臣、尚书、内阁学士、起居注官等职务，极大地扩展了南书房的信息来源。相比于外廷官员，南书房翰林通过内廷身份与皇帝建立起更密切的关系，但其获取消息的尺度和撰拟谕旨的内容，大体仍不出汉官所能知晓的范围。陈邦彦会利用地处清切的优势，与外任亲属和地方督抚互通消息，形成一定规模的交际网。南书房翰林对时政消息的获取和传播，不失为其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南书房 陈邦彦 信息传播 《匏庐公日记》

[中图分类号] K2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6）－02－0028－011

日记作为反映时人生活的百科全书，已被学界广泛关注和使用。近年在南书房的研究中，日记成为“新史料”的主要来源，推动学界不断加深对南书房的认识。[①] 陈邦彦《匏庐公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在影印出版后，相关考察多围绕书籍编纂、物品进献、戏剧演出等问题展开。[②] 本文重点关注《日记》所载政务信息，通过与官修史书及其他日记、文集、书信资料对证，探究南书房翰林通过何种方式获取消息，考察其获取政务信息的边界，以及如何利用消息之便进行潜在的政治活动。

南书房地处内廷，又是非正式机构，其具体活动外人难以知晓。《清史稿》言“南书房以诗文书画供御，地分清切，参与密勿”，[③] 属于后世学者的追述。时人对康熙朝内廷翰林政治活动论述较多的，当属李光地的《榕村续语录》，但李氏并未入直过南书房。清初内廷翰林留下的相

[收稿日期] 2025-03-14

[作者简介] 杜望（1989— ），女，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北京 100029，dw02sd@163.com

① 许文继、李娜：《南书房行走笔下的入直生活——新发现的几部南书房行走自撰史料》，《历史档案》2014 年第 2 期；陈玉兰：《查慎行〈南斋日记〉考证二则》，《文献》2017 年第 2 期；陈含笑：《查慎行“南斋日记”研究》，浙江师范大学 2020 年硕士学位论文。

② 刘水云：《〈匏庐公日记〉与清康熙朝内廷及民间演剧》，《戏曲艺术》2020 年第 1 期；王文欣：《由〈匏庐公日记〉看康熙朝中后期的钦定书纂刻事业》，《文献》2023 年第 1 期；王文欣：《康熙朝中晚期官员进献书画古董相关活动研究——以〈南斋日记〉〈匏庐公日记〉为中心》，《美术大观》2023 年第 10 期。

③ 《清史稿》卷 271，中华书局，1977 年，第 10017 页。

关文字记录有张英的《南书房记注》《南巡扈从纪略》，高士奇的《松亭行纪》《扈从东巡日录》《塞北小钞》，汪灏的《随銮纪恩》，查慎行的《陪猎笔记》《南斋日记》等，其中很少涉及政治活动。作者或出于要公开的考量，只记录“能够写在纸面上”的内容；或要呈交皇帝御览，以歌颂为主基调，成为“盛世”的注脚；或本人性格谨慎，较早意识到文字的潜在风险，不敢留下把柄。而这些他人避之不及的内容，从陈邦彦的日记中却能管窥一二。

陈邦彦（1678—1752），字世南，号匏庐，康熙四十二年（1703）进士，四十四年十二月入直南书房，历任编修、侍讲、起居注官等，五十七年升侍读学士。雍正四年（1726），陈邦彦受钱名世“名教罪人”案牵连被革职，乾隆八年（1743）以原官起复，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①] 十六年再度被革职。[②] 从康熙四十四年入侍内廷到雍正四年被革，陈邦彦连续在南书房行走近二十年。[③] 现存《日记》是从康熙四十五年正月起，此时作者甫入南书房，充满了新鲜和好奇。这一年在南书房行走的翰林有：大学士陈廷敬，工部尚书王鸿绪，内阁学士蔡升元、杨瑄，[④] 起居注官查昇、张廷玉、励廷仪、钱名世、陈壮履、蒋廷锡，[⑤] 翰林院编修汪灏、查慎行和陈邦彦。

陈邦彦早期的日记涉及朝政事务较多，也会记一些他“本不该”知道的事情：

> （四十五年十月廿五日）午刻，宣泽州（陈廷敬）上殿，意拟为晋抚（噶礼）事。
>
> （四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又密谕温冢宰（温达）数语，大概系刑讯言官之意。[⑥]

有时即便不知发生了什么，也要记上一笔：“命莲公（青莲）往益戒堂（揆叙）去，却不知所传何旨。”[⑦]

扈从出巡时，《日记》中时常有“报到”，对应的是《康熙起居注》（以下简称《起居注》）中“各部院奏章三日一次送往行在听理”的惯例。由于南书房直庐有时离皇帝的“帐殿”很近，[⑧] 陈邦彦应该能够了解宫报抵达的时间，但“报到”后处理了几件折本，折本都有哪些内容，按说只有参与者才知晓，对此《日记》也有记录，如“报到，折本二件，一刑部盗案，一刑议莫少司空（莫音代）罪”。[⑨] 对比康熙朝其他南书房翰林的行记，几乎无人涉及此类信息。阁臣王熙在《扈从东巡行程日记》中有“本到”以及赴行宫启奏的记载，可即便王熙切实参与，也不曾提及奏章内容。[⑩] 陈邦彦未必有资格参与，却多次记录折本的处理情况，与同僚相比，陈氏的做法不够谨慎，却也说明《日记》具有较强的原始性、私密性，我们可借此了解南书房文化职能外的更多面相。

一、陈邦彦政务信息来源考

康熙四十五年到四十九年的《日记》，记录了大量南书房工作日常和相关政务信息，其中涉及许多御门听政的内容。作为当时重要的中枢决策方式，御门听政在康熙朝逐渐形成定制，南

---

① 陈邦彦：《题陈不职请赐罢斥》，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A162-111，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 年，第 91017-91018 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 404，乾隆十六年十二月壬寅。

③ 雍正帝即位后，令陈邦彦继续供奉内廷，见陈邦彦：《匏庐公日记》卷 7，《上海图书馆藏稿抄本日记丛刊》第 2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 年，第 461 页。

④ 杨瑄于康熙四十五年二月升任内阁学士，《匏庐公日记》卷 1，第 1 册，第 194 页。

⑤ 蒋廷锡在康熙四十五年十月任日讲起居注官，参见《康熙起居注》，中华书局，1984 年，第 2027 页。

⑥ 《匏庐公日记》卷 1，第 1 册，第 257、262-263 页。

⑦ 《匏庐公日记》卷 1，第 1 册，第 225 页。

⑧ 汪灏：《随銮纪恩》，《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 1 帙，上海著易堂铅印本，1891 年，第 290 页记：“翰林院官帐房许在帐殿南门外，去网城二十步，下于御目所及之近地。”

⑨ 《匏庐公日记》卷 3，第 1 册，第 489 页。

⑩ 王熙：《王文靖公集》卷 13，《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214 册，齐鲁书社，1997 年，第 600 页。

书房翰林亦有资格参与。《日记》对听政的记录十分生动：

（四十八年十月）廿二日，早膳后，御门理事。太常寺卿引见江球、戴璠，戴连跌两次，上注视默然。又黄龙眉、熊苇引见谕德，而太宰误奏云："吏部考功司员外郎员缺，引见张凤翔。"上愕然，太宰急点首遽奏云："两个谕德。"上为之色变……又阁学孙柱启奏，至第十个折本，竟忘了。因揭开折子细看，上急不能待，因取自观之，系直省秋审本，上亦微有怒容。①

由于四十八年的《起居注》已不存，该记录可补史之缺。值得注意的是，听政实际分为两个阶段，"两个阶段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和性质，前一阶段处理的是普通庶务，而第二阶段是与阁臣在一起商榷国家重要的机密事务"。② 南书房翰林能够参与的是处理庶务的"第一阶段"，查慎行曾自记"黎明入朝，上御中和殿，阅视板，复御门。各衙门启奏毕，余辈始得至直庐"。③ 至于处理折本的第二阶段，主要是内阁大学士、学士参与，六部官员、议政大臣均不在场。④ 虽然部分决策会以谕旨的形式发布，但对于公开的政务，陈邦彦往往不屑于记："御门启奏，俱详小抄，无他语。"⑤

《日记》中的听政内容，多是处理折本的第二阶段，且不乏一些决策形成的"过程"。作为一名资历浅、品级低的南书房新人，这些讨论原则上陈邦彦并没有"在场"，他是如何知晓的呢？这里就涉及御门听政的记录者——日讲起居注官。日讲起居注官，又称记注官、讲官，康熙帝曾言："朕以向来起居注官从不回避密奏之事，因令近前侍立，以听所言。"⑥ 陈邦彦的伯父陈元龙在《初充起居注官侍直恭纪》有"叨陪上相闻机密，新进承恩愧史才"⑦ 之句，他在给陈邦彦的信中，言及陈邦彦四叔陈嵩引见后未得授官一事，指点陈邦彦可以去问"是日侍班之讲官科臣"，他们"必知其故"，⑧ 记注官可谓是品级较低的文官中最易接触到"机密"的群体。陈邦彦于康熙五十三年始任记注官，在此之前，他对"御门"第二阶段的了解，很可能是从任起居注官的南书房同僚处得来。⑨ 这在早期《日记》中有所体现，如四十五年四月初九日："御门启奏，澹远（查昇）侍班……是日办事甚久。"⑩ 侍班即任当日讲官，对比《起居注》，这一天确为查昇侍直，且内容颇多。⑪ 再如：

（四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启奏，教忠（励廷仪）侍班。天语赞齐世武第一好官。山东、直隶、河南三抚狠好。部院中唯徐司农（徐潮）、宋冢宰（宋荦）较好……阿制阃（阿山）、噶晋抚（噶礼）皆巧宦。又赞西中堂（席哈纳）诚实，所以大拜也。⑫

《起居注》确有相关记载：

山东、河南、直隶三处巡抚居官甚好……视六部诸臣皆不甚佳，惟徐潮尚可，宋荦亦优……朕于诸大臣中简席哈纳授为大学士，特以彼老成，谨慎小心，是以简任之也……阿山甚巧，既不得谓之善，亦不得谓之非。以此观之，非巧而何？噶礼亦与阿山相同。⑬

---

① 《匏庐公日记》卷 3，第 1 册，第 518–519 页。
② 冉琰：《再谈康熙御门听政》，《民族史研究》第 6 辑，第 281 页。
③ 查慎行：《南斋日记》，《查慎行全集》第 3 册，中华书局，2017 年，第 395 页。按，点校本"视板"应为"祝板"。
④ 徐艺圃：《试论康熙御门听政》，《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 年第 1 期；杜望：《论顺康时期内阁与议政处的关系——以大学士兼议政大臣为中心》，《清史论丛》2021 年第 1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年，第 48 页。
⑤ 《匏庐公日记》卷 3，第 1 册，第 542 页。
⑥ 《康熙起居注》，第 1986 页。
⑦ 陈元龙：《爱日堂诗》卷 5，《陈元龙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23 年，第 113 页。
⑧ 陈元龙：《文简公手书・安信八》，《陈元龙集》，第 880 页。
⑨ 《清圣祖实录》卷 258，康熙五十三年四月丁亥。
⑩ 《匏庐公日记》卷 1，第 1 册，第 223、225 页。
⑪ 《康熙起居注》，第 1962–1964 页。
⑫ 《匏庐公日记》卷 1，第 1 册，第 239–240 页。
⑬ 《康熙起居注》，第 1978 页。

当日汉起居注官就是励廷仪。[①]

当然，也存在记注官对应不上的情况，如四十五年四月十二日《日记》："有启奏，礼叔（陈壮履）侍班……闻是日议论甚多，礼叔却不能全记。"[②] 几乎坐实了听政内容是从侍班的陈壮履处得知，但《起居注》载这一天的汉起居注官为钱名世，[③] 不排除档案记载与实际侍班人员存在出入。[④] 上述涉及的查昇、励廷仪、陈壮履、钱名世不仅时任记注官，也均在南书房行走。

御门结束后，康熙帝与阁臣的部分"密语"，陈邦彦也有所了解：

（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御门后，复留满汉中堂密语，大略言西域之力弱而人傲，不足计较，亦不足抚循，及晋抚（噶礼）之被诬、言官之挟私也。

（四十九年三月十日）启奏毕，上复与汉中堂密论偏沅之事。[⑤]

有一次他却不知所论何事："屏人与中堂密语甚久，即讲官与侍卫俱不得闻。"[⑥] 可见类似"密语"多有侍卫和讲官在场，侍卫以满人居多，且《日记》中很少看到陈邦彦与侍卫的往来，他了解此类消息，应主要通过任讲官的南书房同仁。

作为档案的书写者，起居注官全程参与听政并进行详细记录，十分了解议奏内容。部分记注官亦在内廷行走，私密的工作环境、稳定的同僚关系，加之每日长时段的侍直，使这些原本严密的信息，在"南书房"这一特定工作场景中，成为翰林们工作之余讨论的对象。康熙朝起居注制度被废之前，曾发生过记注官陈璋、赵熊诏"私抄谕旨案"，[⑦] 可见起居注档案泄露并非孤例，涉事的赵熊诏当时亦任职南书房。

除了记注官，全程参与听政的还有内阁大学士、学士，康熙四十五年时，内阁学士蔡升元、杨瑄均任职南书房，即便当日讲官不是内廷翰林，陈邦彦也可从蔡、杨二人处了解听政的情况。内阁学士为正三品官，参与的政务范围较讲官进一步扩大：

（四十五年三月廿二日）酉刻，读卷官至西暖阁读卷。上以进呈卷俱平常，不甚喜。二甲本拟一百余名，上止留五十名。又革去四人，停科十一人。上云："此四人中，张志栋的儿子尤为不通。"上又云："本朝状元，从无一个成材的。如韩菼还算会做文字，却每日吃酒，总不成材。"[⑧]

殿试被黜的张勿我，即张志栋之子，对韩菼的不满在《起居注》中也有体现。[⑨] 此次殿试的读卷官就有蔡升元和杨瑄，陈邦彦虽无资格参与，却能通过南书房同僚知晓部分阅卷场景。

大学士陈廷敬和尚书王鸿绪亦在南书房行走，部分政务处理也经由南书房：

（四十五年三月）初二日，榜发，上御经筵后，即将《题名录》发南书房，问江南取用者内有几人？……又问其中世家名士，陈中堂（陈廷敬）、王司空（王鸿绪）俱一一指奏。

（四十八年十一月十日）巳刻，郭首领（郭廷枚）同青莲来问泽州（陈廷敬）云："今日门上下的旨意何如？"泽奏云……[⑩]

---

① 《康熙起居注》，第 1979 页。

② 《匏庐公日记》卷 1，第 1 册，第 226 页。

③ 《康熙起居注》，第 1966 页。

④ 《起居注》对于记注官的记载比较真实，但也有一些挂名成分，如康熙四十二年北巡，扈从起居注官里有揆叙、查昇，实际上揆叙在出巡后期才出使朝鲜归来，查昇的手因坠马受伤无法写字，两人均难以承担实际的记注工作。《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 18 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9 年，第 10169 页；查慎行：《陪猎笔记》，《查慎行全集》第 3 册，第 200、206、229 页。

⑤ 《匏庐公日记》卷 1，第 1 册，第 254–255 页；卷 3，第 1 册，第 565 页。

⑥ 《匏庐公日记》卷 3，第 1 册，第 559 页。

⑦ 《康熙起居注》，第 2370 页。

⑧ 《匏庐公日记》卷 1，第 1 册，第 215–216 页。

⑨ 《康熙起居注》，第 1956–1957 页。

⑩ 《匏庐公日记》卷 1，第 1 册，第 204–206 页；卷 3，第 1 册，第 530–531 页。

青莲是对接南书房的太监，康熙帝讨论部分政务时没有回避南书房翰林，也使陈邦彦能够亲历更多事务。此外，太监也是消息传播中不容忽视的群体：

（四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又闻上在内与内侍闲论云："人家做官，有银子钱，钻营谋干，无非被人撞骗，费了钱财。央人启奏，无论奏而成了，固赖不得，即奏而不成，彼云：'你自命运不好，万岁不佑，我却替你奏了，所许东西仍旧要的。'甚为可笑。"

（四十七年正月九日）是日，直王上殿看活计。上谕云："我们做大主子的，贵持大体，凡作聪明呈伎巧之事，须让工匠为之。如我辈亦为之，则此辈人便无生计矣……"[①]

这些内容，陈邦彦应是通过太监获知。四十五年十一月的《日记》有："莲公又来，闻系密谕吴兴阁学算前星龙造，此语甚密秘之云云。"[②] 内容似是而非，但能看出是从青莲处闻知。

陈邦彦入侍内廷不久，其《日记》就涉及康熙帝与阁臣、内侍，甚至是与皇子的言论。通过与实录、《起居注》对证，不难发现《日记》对时事的记录具有较高准确性。陈邦彦的消息也十分灵通，四十六年十月廿三日，他下直后即"往贺静永（宋骏业）副宪"，[③] 就在前一日，副都御史的人选还未确定，[④] 可见宋骏业获得任命当天，陈邦彦就得到消息并前往祝贺。侍直南书房，意味着拥有丰富、可靠、迅捷的信息源：一方面，部分政务的处理会经由南书房；另一方面，许多内廷翰林在外廷有职任，上至阁臣、尚书，下至内阁学士、起居注官，他们对政务的深度参与成为陈邦彦了解信息的重要渠道。

二、陈邦彦获取消息的尺度——兼谈南书房撰写"密谕"

作为皇帝一手组建的秘书班子，南书房直接服务于皇帝，对皇权的依附程度也更高。康熙帝时常通过南书房了解民情：

（四十五年四月）十六日，青莲下来传旨云："朕因近来无雨，每日焦心，身体瘦了一半，你们在里头走的与外人不同，凡有所闻，不妨直说。"

（四十六年七月廿六日）莲公下来问："江浙天旱，尔等有家信否？"[⑤]

通过这些传谕和询问，陈邦彦大致能够了解皇帝近期的"关注点"乃至"焦虑点"：

（四十六年七月廿一日）上颇以苏州盗贼为念。

（四十六年八月二日）午刻报到，有两江总督报旱报荒奏折，圣心深以为忧。[⑥]

四十七年正月，闻浙江有盗贼"啃聚四明山中"，康熙帝言："汝等如有家信来，可详细奏知，不必隐瞒。"南书房翰林对此亦心知肚明："臣等蒙君恩置内直，与外廷不同，何敢隐而不奏。"[⑦] 翰林们通过"内廷"身份与皇帝建立起更密切的关系。康熙帝曾下令在江浙"兴水利、建闸座"，[⑧] 以起到蓄水灌田、抵御旱涝之效。《日记》有"建闸之论，创自大司空（王鸿绪），上在内深加褒奖"，[⑨] 内廷翰林有更多机会向皇帝进言，进而影响最高统治者的认知乃至决策。

由于每日侍直时间长，南书房一般会有赐食，遇节庆则有额外宴席。如四十五年端午节，

① 《匏庐公日记》卷 2，第 1 册，第 340–341、368–369 页。
② 《匏庐公日记》卷 1，第 1 册，第 264 页。
③ 《匏庐公日记》卷 2，第 1 册，第 332 页。
④ 《四十六年十月起居注稿本残卷》，《清代档案史料选编》第 1 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年，第 780 页。
⑤ 《匏庐公日记》卷 1，第 1 册，第 229 页；卷 2，第 1 册，第 311 页。
⑥ 《匏庐公日记》卷 2，第 1 册，第 310、313–314 页。
⑦ 《匏庐公日记》卷 2，第 1 册，第 368 页。
⑧ 《清圣祖实录》卷 231，康熙四十六年十一月乙亥。
⑨ 《匏庐公日记》卷 2，第 1 册，第 350 页。

“赐宴一席”；六十一年元旦“早朝后，蒙赐内宴一席”。[1]公主下嫁，南书房亦有赐宴，[2]甚至妃嫔过生日，“直房俱有寿果、寿宴之赐”。皇子招待皇帝时也会为直房安排随桌[3]：

> （四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驾率宫眷幸四贝勒园，皆演新戏，闻第一出乃《百老上寿》，所用梨园至百二十人，所歌之曲，皆吴、卢两公新谱。天颜甚喜，闻前星及诸王皆不乐也。直房俱有随桌。[4]

胤禛为博皇父欢心，颇费了一番心思，却因此得罪了太子等人。皇子之间的微妙关系，汉官多无从了解，由于南书房翰林俱在随桌，陈邦彦作为亲历者，这一记录的可信度较高。

但也应看到，陈邦彦所了解的政务消息多为日常庶政。康熙帝曾言“汉官不谙军旅”，[5]即便扈从亲征，汉官也主要负责文字工作。有一次“满九卿有启奏，闻系边防”，[6]相关事务的处理，汉官多不在场，陈邦彦也无从知晓。《日记》有：

> （四十七年五月二日）晚刻，闻浙江有密折至，系十日驰到，上亲旨来人密问，屏去左右，即遣义气满洲及西北达子四人前去，限六日到杭。[7]

隐约能看出事务隐秘且急迫，但陈邦彦并不知所为何事。对于皇家及八旗内部的事务，《日记》涉及较少，叙述也不甚周详：

> （四十五年四月）初七日，直王（胤禔）之公主因下降三日来见，上云：“今日是极不利之日，遽尔引见，一何疏忽至此？”将包衣大二人革去。又闻因别事撤回。[8]

既然南书房能够了解的信息仅限于汉官知晓的范围，那么翰林们是否有资格撰拟谕旨，甚至是“密旨”呢？对于南书房是否参与草拟上谕的问题，赞同者以康熙帝曾言高士奇“凡密谕及朕所览讲章、诗文等件，纂辑书写甚多”[9]作为直接证据；反对者则认为相关说法多为后人的揣摩之词，即便确有翰林参与撰拟谕旨，也只是个别情况，不能延伸为整个南书房的执掌。[10]

由于《日记》记录了很多“秘密”，陈邦彦也不避讳曾“往吏部宣旨”等传谕行为，[11]如果他曾参与撰拟“密旨”，或能找到蛛丝马迹。《日记》所载陈邦彦奉命草拟的谕旨，在内容上与“密谕”有着明显差异：

> （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莲公下来，命彦写一信与励（励廷仪）、蒋（蒋廷锡），若尚未全愈，须养得大好方出门前来，不必急之。又命写一信，细问澹远（查昇）体中若何。随拟稿呈览，即从宫报中发去。[12]

南书房翰林查慎行也有过类似记载：

> （四十二年六月廿四日）奉上谕：“尔等即传旨与陈廷敬同王鸿绪，将部院、督抚、提镇、内外文武以及闲散年老官员等类，比照从前之例，分别门类，每类各拟对联四十副。查考书籍，从容拟撰，俟回宫日进呈，钦此。”即草一稿，先呈御览，从报上寄去。[13]

从程序上看，奉旨、拟写、呈览、发出，确为撰述谕旨。一些简单的“传谕”甚至无须进呈御览：

---

① 《匏庐公日记》卷1，第1册，第235页；卷7，第2册，第355页。
② 《匏庐公日记》卷1，第1册，第225、235、247页。
③ 《匏庐公日记》卷2，第1册，第353、404页。
④ 《匏庐公日记》卷2，第1册，第338页。
⑤ 陈元龙：《丙子正月扈从圣驾亲征沙漠恭纪三首》，《爱日堂诗》卷9，《陈元龙集》，第209页。
⑥ 《匏庐公日记》卷1，第1册，第187页。
⑦ 《匏庐公日记》卷2，第1册，第427页。按，此密折疑为“朱三太子”及其子押解到浙江后的奏报，但有待进一步证实。
⑧ 《匏庐公日记》卷1，第1册，第222页。
⑨ 《康熙十七年〈南书房记注〉》，《历史档案》1995年第3期。
⑩ 朱金甫：《论康熙时期的南书房》，《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2期。
⑪ 《匏庐公日记》卷1，第1册，第229页。
⑫ 《匏庐公日记》卷2，第1册，第299页。
⑬ 查慎行：《陪猎笔记》，《查慎行全集》第3册，第207页。

（四十三年五月十四日）午后奉旨，令臣等公拟普陀观音寺碑文。再传旨，召祭酒孙〇〇（孙岳颁）于次早赴畅春园，即发片纸去。[①]

（四十六年六月廿八日）莲公下来传旨："近来一路水发，励（励廷仪）、蒋（蒋廷锡）不必急来，过桥渡河须小心为主，着写字与他。"[②]

作为皇帝的命令或指示，现存谕旨一般是正式文本，但南书房接到的多为口谕。在当时的情境下，只要是皇帝下达的非公开谕旨，似乎都可归为"密谕"。对臣民而言，皇帝的谕旨至关重要，故清人所言南书房诸臣"撰述谕旨"、[③]草拟"特颁诏旨"，[④]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书房的职能，没有过分夸大。但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这些"谕旨"与相对成熟的公文不同，多为皇帝口谕；内容通常与内廷翰林及其日常工作有关，比较零散、随意，也无关国政，故认为南书房不具备撰写谕旨的政治职能。因此，对于南书房是否具有"撰拟谕旨"职能的分歧，主要源于清人和后世研究者对"谕旨"的理解不同。[⑤]

康熙帝将内廷翰林称为"南书房蛮子们"，[⑥]反映了他对汉人的偏见，这一记载出现在《日记》中，说明陈邦彦等汉官对这一偏见的默认与接受。内廷翰林能够了解到更多消息，但大体不出汉官群体所能接触到的范围。虽不能由此断定南书房绝不涉密，如此前学界反复提到的弹劾明珠案，《日记》也两次提及康熙帝召见南书房翰林励廷仪"进内面对"，"屏人密语，至秉炬而出"，[⑦]但这种情况仅属个别。以汉人为主体的南书房，几乎不可能跨越满汉畛域，成为政事决断的主体。

三、陈邦彦隐性的政治活动

尽管对南书房的政治职能不宜估计过高，但内廷翰林身处"禁密之地"，即便主要承担文化职能，也很难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陈邦彦在南书房了解到的信息虽无关军政，但哪怕只是行政日常、皇帝喜好等，也足够其经营走动。最典型的，当属陈邦彦与伯父陈元龙的消息往来。

陈邦彦幼年丧父，主要由母亲抚养长大，在学业和仕途方面则依赖陈元龙的指点，[⑧]两人虽为伯侄，却情同父子。陈元龙是康熙二十四年榜眼，曾长期任起居注官，并在南书房行走。陈邦彦入直南书房前夕，陈元龙曾有一封长信。信中提醒他注重官场礼仪，并向内廷翰林查慎行、陈壮履、钱名世、蒋廷锡、张廷玉、杨瑄、蔡升元各去一札，由陈邦彦转递，在致以问候的同时，也将陈邦彦郑重介绍给南书房诸位同仁。因邹氏系元龙"提拔之人"，陈元龙还指点陈邦彦去找邹元斗："若来见，乞一见之，留之款洽，加以小惠。彼在南薰殿修书，亦可广闻见也。"[⑨]为筹备皇帝南巡时所要进献的物品，陈元龙让陈邦彦留心皇帝喜好：

南幸之信，究竟若何……第一件苦事，无物可进，吾侄留心，细细访问，内中近尚何等物

---

① 查慎行：《南斋日记》，《查慎行全集》第3册，第321页。

②《匏庐公日记》卷2，第1册，第302页。

③ 赵翼：《簷曝杂记》卷2，《簷曝杂记 竹叶亭杂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41–42页。

④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4，中华书局，2005年，第51页。

⑤ 柯文指出，历史研究应该注重"移情"的分析方法，"设身处地体会对方的思想、感情和处境"，"就是'卸下'那张紧紧地裹着史家自身的文化的、历史的乃至个人的'皮'，然后钻进他所研究的对象的'皮'中去"，亦可解释古今史家关于南书房在撰写密谕职能上的分歧。林同奇：《"中国中心观"：特点、思潮与内在张力》，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1页。

⑥《匏庐公日记》卷3，第1册，第443页。

⑦《匏庐公日记》卷2，第1册，第314页；卷1，第1册，第220页。

⑧ 陈邦彦在《次韵家相国伯父八十初度述怀诗》序中曾言及陈元龙对他的影响："邦彦幼蒙教育，长登仕籍，追随有年，于群从中受恩最深，受知最切。"《陈元龙集》附录三《春晖堂和诗》，第963页。

⑨ 陈元龙：《文简公手书・安信八》，《陈元龙集》，第880–881页。

件？（元之［陈世仁］昨已到家，据言京中近日不要古董，确否？如不要古董，则更无物可进矣。）即寄信来，以便访求豫备。盖京中已尚，而南方不知，则尚易买也。[①]

为防"洛阳纸贵"，甚至都算好了时间差。《日记》中有不少向皇帝进呈物品的记录，或与陈元龙这一请托有关。而陈世仁打听到的"京中近日不要古董"，也非空穴来风，之后陈诜、陈邦彦的进献，康熙帝只留旧书、诗册，古董则"一概不收"。[②] 最后，陈元龙叮嘱陈邦彦："京中凡一切见闻，并一应闲事，吾侄无暇，乞嘱学兄时时写来"，并强调不要费工夫写"抄报的随口直话"。[③] 通过书信，陈元龙为侄子传授为官经验、拓展人脉关系，陈邦彦则不间断地为伯父提供京师未公开的消息以及各处的最新动态。

陈邦彦入仕时，陈元龙已回乡照料年过八旬的父亲陈之闇。康熙四十九年，陈元龙丁忧期满，升掌院学士不久，又赴桂林任广西巡抚。陈元龙临行前对陈邦彦十分不舍："爱侄遄归扈从劳，牵衣执手对银膏。同朝一载多睽隔，（舍侄时扈从苑中，又随出口。虽同官经年，聚首不及十旬也。）话别今宵倍郁陶。"[④] 因聚少离多，两人书信往来十分频繁，甚至每日一封或一日两封。[⑤] 陈邦彦一度将写给陈元龙的信件编号，以韵字号的一百封信为例，一号信是五十二年十月廿二日发出，一百号信则写于五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⑥] 此外还有多封不列号信。这期间陈邦彦在京师，陈元龙在桂林，虽相隔遥远，但陈邦彦给伯父寄信的频率约为六日一封。

陈元龙颇得为官之道，历仕两朝，虽有起伏，却得善终，官至内阁大学士。他早年有植党营私的前科，外放广西，亦缘于康熙帝对他的不满："陈元龙……自任侍郎以来，常保荐人，行事不端。任伊以边疆之职，试其办事何如。"陈元龙外任期间，其子陈邦直中康熙五十四年进士，但这一年科考"声名不好"，[⑦] 争议很大，时人为此还编了小说，其中就有"苦周旋陈邦直得第"，直言陈元龙"极其周旋翰林以为伊子之计"。[⑧] 虽为戏说，也可见陈元龙在时人心中的形象。通过给陈邦彦的信，我们不难发现，陈元龙虽身居广西，于各省人事极为熟悉：

（五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浙、豫二公（王度昭、鹿祐），既有此问，虽大廷回奏尚好，然二公必具疏求退。又闻滇抚（吴存礼）丁内艰，恐明春必有虚席，江夏（黄国材）甚为引领。顷制公（赵弘灿）面许江夏，若入觐必为力保，盖制与东省之抚提俱大不睦……倘其入觐之请已奉俞旨，则渠新正灯前必就道，三月初必到京，吾侄可加意周旋之，为之稍效微劳，俾其□有征验，则渠益倾心于我。此亦一着要紧棋子。盖渠乃功臣之子，眷尚隆而信尚笃耳。[⑨]

此前康熙帝曾就浙、豫两巡抚为官情况传问九卿，九卿回奏：

浙江巡抚王度昭前居官亦有才能，今不尽心为民，全无益于地方。河南巡抚鹿祐向来居官谨慎，此数年来精力衰迈，处事不当。诚如圣谕。[⑩]

---

① 陈元龙：《文简公手书・安信八》，《陈元龙集》，第 880 页。

② 《匏庐公日记》卷 1，第 1 册，第 277 页；卷 2，第 1 册，第 379 页。

③ 陈元龙：《文简公手书・安信八》，《陈元龙集》，第 881 页。

④ 陈元龙：《十月二十二日之任桂海出都书怀四首》，《爱日堂诗》卷 16，《陈元龙集》，第 360 页。

⑤ 如康熙五十四年五月二十二、二十三日，陈邦彦连发韵字八十三、八十四号信，均是寄给陈元龙；雍正元年八月"初四日辛亥，晨起，发爱日一禀。晚刻，又发爱日一禀"，爱日为陈元龙的堂名，《匏庐公日记》卷 4，第 2 册，第 89 页；卷 8，第 3 册，第 44–45 页。

⑥ 《匏庐公日记》卷 4，第 2 册，第 24、101 页。

⑦ 《清圣祖实录》卷 142，康熙二十八年九月壬子；卷 247，康熙五十年八月辛酉；卷 267，康熙五十五年二月己巳。

⑧ 《乙未会试科场案》，《清代档案史料选编》第 1 册，第 861 页。作于康熙三十五年的《陈元龙书札》中有："兹值录科，两舍侄俱有志观场。伏乞垂神……终始玉成，皆出鸿造。侍即日随銮行矣，归期难定，大约秋初，定当凯旋。龙塞乡思，惟望两舍侄早有成立，以慰亲心。"此处两侄即陈邦彦、陈邦怀，陈元龙对侄子尚且如此尽心，为其子周旋也在情理之中。《陈元龙书札》，故宫博物院藏。

⑨ 陈元龙：《文简公手书・安信五》，《陈元龙集》，第 876 页。

⑩ 《清圣祖实录》卷 260，康熙五十三年十月壬辰、丁酉。

结果也确如陈元龙所料，鹿祐致仕，王度昭调任工部右侍郎，云南巡抚吴存礼因丁忧回旗守制。[①] 陈元龙认为黄国材是巡抚的重要备选，且有两广总督赵弘灿"力保"。赵弘灿已上奏折请求进京陛见，[②] 如获允准，五十四年三月初"必到京"，陈元龙授意陈邦彦"加意周旋"，赵弘灿是清初名将赵良栋之子，圣眷正隆，是陈元龙眼中的"一着要紧棋子"。

因赵弘灿进京一事未获允准，陈元龙的计划没能成行。但陈邦彦在此之前已与黄国材、赵弘灿等人建立了书信往来。五十二年十二月，赵弘灿之子赵之垣携父亲手札拜访陈邦彦，并"以两黄杯、六缎、六纱、六绢见寄"，陈邦彦"即发回札"。赵弘灿之弟赵弘燮曾任直隶巡抚十年，后加总督衔，与陈邦彦亦有联络，还曾赠与陈邦彦"骡一匹，绒廿丈"。[③] 至于陈元龙盛赞的黄国材，[④] 在康熙中后期历任广东按察使、广西布政使、贵州巡抚、福建巡抚，与陈邦彦通信亦较为频繁，见面则"晤谈竟日"。[⑤] 陈邦彦与当时诸多地方大员有过信件往来，如年羹尧、朱轼、蒋陈锡、徐元梦、吴存礼等，为中央与地方的消息传递提供了可能。

与赵翼所描述的高士奇善于探听消息，引得众人追捧的情形相比，[⑥]《日记》、书信中陈邦彦的政务活动更显低调隐秘。陈邦彦联络较多的督抚藩臬，相当一部分曾任职于他的家乡：徐元梦、朱轼、屠沂、李馥曾任浙江巡抚，王之鳞曾任浙江按察使，段志熙、傅泽渊曾任浙江布政使。江浙是陈邦彦亲朋聚集之地，尽管陈邦彦的家族——海宁陈氏在当地势力很强，但也要与地方长官搞好关系。另一部分则是由其外任亲属延展而来，如妻弟汪俊任职陕西醴泉时，陈邦彦会写信给陕西巡抚永泰；陈元龙在广西任职时，陈邦彦与当时的两广总督赵弘灿、广西布政使黄国材、广西按察使年希尧均有联系，王沛憻初任广西布政使时还会主动投书，向陈邦彦示好。[⑦] 地方官虽有权势，但远离中枢，消息闭塞，通过结交陈邦彦拓宽信息渠道，陈邦彦亦可在此过程中广交游，维护并发展自身及家族的势力。

除了伯父陈元龙及其子陈邦直，陈邦彦联络较多的亲属还有堂伯陈诜及其子陈世倌。陈世倌这一时期在翰林院任职，陈诜则先后于康熙四十四年任贵州、湖广巡抚，五十年回京，历任工部、礼部尚书。陈诜父子与陈邦彦都在京时，会时常见面；陈邦彦扈从出京后，则通过信札传递消息。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康熙帝途经喀喇河屯，因"商贾毕集，即买古董者俱有，命侍卫等遍觅送看"。难得皇帝主动要看古董，随侍诸臣纷纷响应："一时字画玩器，凡扈从行囊，搜罗殆尽。"四天后，家仆携带陈邦彦的十余封信回京，其中有寄给家人的，也有寄给南书房同仁查昇的。七月初八日，查昇遣人至皇帝行在，同来的还有陈世倌，代父"进折并贡献"。[⑧]虽然陈世倌是陈邦彦的堂弟，但《日记》并未掩饰这次"失败的送礼"：

> 初九日，彦早入直，代澹远（查昇）启奏进折，所进玉杯乙对，旧扇十柄，酒娘十罐，糟鹅蛋四瓶，俱收。随命莲公下来，同至宫门外，问来人澹远近状，极其详细……即至千岁处进折，所进古董不收，止收酒娘、鹅蛋，批答甚长，极其真挚。
>
> 秉之（陈世倌）所代进皇上物件俱不收，止留鸡踪菜四瓶，绝无温旨。进千岁之古董十六件，俱收，随赐黔抚"绥岩徵"三字。[⑨]

---

① 《清圣祖实录》卷 261，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乙酉、乙亥、己巳。
② 《两广总督赵弘灿奏请陛见折》，康熙五十三年十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5 册，档案出版社，1985 年，第 799–803 页。
③ 《匏庐公日记》卷 4，第 2 册，第 33 页；卷 5，第 2 册，第 117、155、160 页。
④ 陈元龙：《文简公手书 · 安信五》，《陈元龙集》，第 875–876 页。
⑤ 《匏庐公日记》卷 7，第 2 册，第 454 页。
⑥ 赵翼：《簷曝杂记》卷 2，第 42 页。
⑦ 《匏庐公日记》卷 4，第 2 册，第 66 页；卷 6，第 2 册，第 313–314 页。
⑧ 《匏庐公日记》卷 1，第 1 册，第 302–304 页。
⑨ 《匏庐公日记》卷 1，第 1 册，第 305–306 页。

皇帝、太子对待查昇和陈诜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查昇的进献悉数收下，还十分关心其身体，询问详细，批答真挚；陈世倌替父亲的进献，皇帝“俱不收”，且“绝无温旨”，太子虽收了古董，但所赐“绥岩徵”颇具警示意味。

康熙帝如此不留情面，恐怕也是察觉到其中的蹊跷：陈诜远在贵州，从皇帝令臣下搜集古董，到陈世倌前来进献，前后相隔仅八日。按照当时信息传递的速度，此事恐怕陈诜都不知道。① 应是陈世倌收到陈邦彦信札后，自作主张，代父进献。但陈诜与查昇的情况不同，查氏在内廷行走多年，深得皇帝宠信，因身体原因未能扈从出行，闻讯遣人进献，是与皇帝君臣相得；皇帝征集古董主要面向内廷，部院大臣尚不知晓，陈世倌代表时任贵州巡抚的陈诜前来，则显得格外扎眼。

南书房翰林与家人的消息往来向为康熙帝所默许，他甚至希望能够通过翰林的家信了解更多消息：“近来闻浙江多贼，家中有信来否？不知贼自何方来的？”他也不回避大臣利用“私人关系”办理“公事”，南书房翰林蒋廷锡之兄蒋陈锡任山东巡抚时，会通过蒋廷锡向皇帝进呈“麦收奏折”，② 很快就得到了批复。陈元龙任广西巡抚时，会让陈邦彦代为上奏；③ 皇帝给陈元龙的赏赐有时也通过陈邦彦转达。④ 但陈世倌的贸然进献，显然超出了皇帝能够容忍的信息传递范围，不仅没能起到逢迎之效，反而受到严厉警告。

四、余论

此前学界对于南书房的政治职能，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强调南书房有政治职能，多以高士奇、王鸿绪为例，说明南书房撰写密谕、充当皇帝耳目的作用；以“章疏票拟，主之内阁。军国机要，主之议政处。若特颁诏旨，由南书房翰林视草”，⑤ 说明康熙朝内阁、议政处和南书房的三足鼎立之势；更以内廷翰林策划弹劾明珠案作为南书房参与政务的典型事例。⑥ 持相反意见的学者则认为，南书房在成立之初，康熙帝“就曾专门告诫入值南书房的翰林‘勿得干预外事’”，且南书房以汉人为主，就人员组成来说，康熙帝“决不可能令他们参与政事”。⑦

结合陈邦彦的日记，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第三种结论：南书房既不像张英、查慎行所记录的，仅从事编纂、校对、鉴赏、撰文等文化工作，也不像清人笔记史料形容的那么枢密、机要，南书房翰林会利用其获取信息的优势，扩充和经营人际关系，其政治活动具有较大的弹性空间。康熙帝设立南书房的初衷，是令文学侍臣“惟经史讲诵是职”，⑧ 但内廷翰林“不与外事”的状态仅存在于南书房成立初期，从康熙二十四年起，内廷翰林张英在外朝的官职已呈现“频徙累迁”之势。⑨ 内外区隔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内廷翰林在外廷任职，他们的实际活动也逐渐偏离皇帝最初的定位，而这些“灰色地带”是多数翰林在记录时有意隐晦的。《日记》作为陈邦彦未打算公

---

① 以陈邦彦日常在京师收到的家信为例，从浙江寄来一般需走二十日，从桂林寄来需一个月。前文也提及，即便是官方驿递，浙江到京师的加急密折也需“十日驰到”，皇帝专门遣人传旨，则是“限六日到杭”。

② 《匏庐公日记》卷 2，第 1 册，第 366 页；卷 3，第 1 册，第 463 页。

③ 《广西巡抚陈元龙奏报禾稻十分收成折》，康熙五十四年八月初五日，《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6 册，第 414–415 页；《广西巡抚陈元龙奏报接署总督印务前赴广东折》，康熙五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7 册，第 571–573 页。

④ 《广西巡抚陈元龙奏谢颁赐石砚折》，康熙五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广西巡抚陈元龙奏谢钦赐珐琅宝器折》，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一日，《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7 册，第 91–93、423–426 页。

⑤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 4，第 51 页。

⑥ 李娜：《清初南书房述论》，《清史论丛》2008 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 年，第 120–123 页。

⑦ 朱金甫：《论康熙时期的南书房》，《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 年第 2 期。

⑧ 张英：《内廷应制集序》，《张英全书》上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319 页。

⑨ 殷红：《康熙朝的政治与文学：以南书房翰林群体的应制创作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 年，第 58 页。

开的稿本日记，书写时少有禁忌，与陈邦彦联系密切的陈元龙、陈廷敬、王鸿绪、查慎行等均有丰富的史料留存，可与《日记》相互印证，进而加深对南书房的认识。

《日记》为考察康熙朝后期的南书房提供了许多新材料，也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突破口。如果单方面强调南书房的政治职能，或许难以找出更多实据，但从南书房翰林的实际活动入手，仍然能够发现广泛存在的、隐性的政治活动。以中央和地方的消息传递为例，虽为学界共识，但因相关史料多已不存，难以形成完整的逻辑链条。[①] 南书房翰林对于诸多消息的获取和传播，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潜在影响，值得继续挖掘和探究。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承蒙学友谷卿、王文欣指点，在此一并致谢！）

References

Li Na. “Qingchu Nanshufang shulun” (The review on Southern Study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Qingshi luncong* (The Qing History Forum) 2008.

Paul A. Cohen. *Zai Zhongguo faxian lishi: Zhongguo zhongxinguan zai Meiguo de xingqi*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Translated by Lin Tongqi.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2017.

Yin Hong. *Kangxichao de zhengzhi yu wenxue: yi Nanshufang hanlin qunti de yingzhi chuangzuo weizhongxin*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during the Kangxi period: centered on the Southern Study Hanlin writing poetry or essays upon the emperor’s orders).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2023.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Activities of Hanlin Scholars in the Southern Study during the Kangxi Reign: Centered on Chen Bangyan’s *Diary of Master Pao Lu*

DU Wa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dw02sd@163.com)

Abstract: The *Diary of Master Pao Lu* reveals a wealth of political information obtained by Chen Bangyan while he served in the Southern Study.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Kangxi reign, most Hanlin Scholars in the inner court concurrently held positions such as cabinet ministers, ministers of state, Grand Secretaries, and official diarists, greatly expanding the information sources of the Southern Study. Compared with officials from the outer court, the Hanlin Scholars in the Southern Study established a clos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emperor through their “inner court” status. However, the scope of information they acquired and the content of the edicts they drafted generally remained within the scope of what Han Chinese officials could know. Chen Bangyan took advantage of his position in the inner court to exchange information with relatives serving in other positions and local governors, forming a sizable social network. The acquisi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political news by Southern Study Hanlin scholars constituted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ir political activities.

Keywords: the Southern Study, Chen Bangyan,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Diary of Master Pao Lu*

① 晚清史料留存相对丰富，已有学者进行相关尝试，如韩策：《疆吏与军机如何互动？——胡林翼的京城联络及其意义》，《近代史研究》2023 年第 4 期。